

第參章 人生後期的思想探索

國民政府自 1930 年以來所奉行的國策為攘外必先安內，即先解除中共這個心腹大患，再正面應付日本軍國主義的挑釁。然而面對日本的步步進逼，「國之將亡」的民族危機如山雨欲來，當時的中共以反帝國主義的先鋒自誓，針對 1931 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的肆意侵略，發出救國號召，不過一般知識分子和城市居民處在國民政府的穩定統治下，很難受到感動，反而認為中共處在遠離日軍威脅的窮鄉僻壤，根本是在利用日軍挑釁，趁國民政府無暇他顧，來擴大自己的根據地。¹但即便如此，在城市地區，尤其是大都會上海，確曾出現一批傾心馬列主義的愛國知識分子，轉為關心中共的前途與發展，顧準即為一例。由於九一八事變的衝擊和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情懷，顧準認為只有中共才是中國未來的唯一希望，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討論，1934 年 2 月，顧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們籌組一個信仰馬列主義的團體—「進社」。「進社」的成立象徵顧準步上革命道路的開始，儘管此時中共正處在被國民政府追擊和圍剿的低潮時期，但對已擁有一定社會地位和成就的顧準，卻是自發性地參與中共的革命活動。只不過，顧準的革命歷程並不像他在會計專業上一樣順遂，相反地，他的革命生涯最終甚至是以悲劇收場，而也正因在革命隊伍中的挫折，使得他開始從批判角度去反思革命及其理論，並且構畫民族國家與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

第一節 革命生涯的屢番挫折：四上四下

1934 年 2 月，以顧準為核心，成立了一個自發而秘密的馬克思主義團體—進社，其最初成員是顧準周圍的立信會計事務所的同事和立信會計夜校的學生共八人。²進社的活動可以分成兩個時期，該年的 2 月到 5 月為無領導關係時期，形式是每週一次的座談會，內容則是談論政局和理論學習。³不過，參與成員逐漸覺得這樣每週一次的座談會仍是革命的言談，起意要訴諸革命行動，遂在 5 月起與中共的外圍組織—「遠東反帝同盟中國分會」建立從屬關係，並在該會領導劉丹的指導下，選舉成立一個幹事會，作為正式領導機構，且推派顧準為該會負責人；另外還辦理一份油印雜誌《前衛》，以利進行團體內部的革命宣傳；同時，根據反帝同盟的指示，顧準更帶領進社成員參加中共下級組織—基督教青年會所主辦的讀書會，做為參與群眾運動的一部分。⁴可以說，自 1934 年 5 月以後，顧

¹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 1002-1003。

² 陳敏之，〈顧準傳略〉，載於陳敏之著，《我與顧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頁 8-21。

³ 顧準，《顧準自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 21。

⁴ 高建國，《拆下肋骨當火把—顧準全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 68-70；羅銀勝、梁倩婷，《顧準畫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頁 48-50。

準就隸屬在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從事革命活動，而他更在 1935 年經上級領導的推薦成爲中共黨員。

回顧顧準一生的革命歷程，若 1934 年 3 月進社成立象徵開始投入革命運動，而 1952 年在三反運動中突遭撤換所有職位則是步下政治舞台，透過下表將可以清楚了解顧準在革命經歷的載浮載沉，並且在「四上四下」後開始對政治產生疏離，從而嚮往對學術的追求。

顧準革命與從政生涯「四上四下」表

	職務先後變化	最終結果	原因分析
上海時期 1934 年 3 月 至 1940 年 7 月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1934 年 2 月成立進社，成爲該社主要領導。2. 同年 5 月，進社接受中共上海遠東反帝同盟中國分會的領導。3. 同年 8 月被收編納入中共中央軍委領導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被任命爲上海市分會主席和總會宣傳部副部長。4. 1935 年 2 月，經武衛會黨團書記林里夫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5. 1936 年 2 月轉入上海各界救國會黨團組織工作，被任命爲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6. 1937 年 8 月，任中共江蘇省職員運動委員會書記。7. 1939 年 7 月調離職委，改任省文化界運動委員會副書記。	從職委書記降職爲文委副書記。	顧準所屬上級領導劉長勝不滿他把戰時性質的救亡組織改變爲公開合法的群眾性聯誼團體，對其心生不滿進而批評其工作上存在錯誤路線。 ⁵

⁵ 顧準，《顧準自述》，頁 112；羅銀勝、梁倩婷，《顧準畫傳》，頁 74-75。

<p>蘇南時期 1940年8月 至 1941年7月</p>	<p>1. 1940年7月，顧準自行請調蘇南根據地駐蘇常太區，並被任命為東路特委委員、宣傳部部長。</p> <p>2. 1940年10月，隨其領導譚震林移駐澄錫虞區，任工委書記兼總辦事處副主任。</p> <p>3. 1941年4月，改任東路特委委員兼蘇南第二行政區委員。不到一個月，改任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實際上完全離開東路特委的工作。</p>	<p>1941年7月，顧準遭東路特委調離該區所有職務，並被命令到第四軍軍部另行分配工作。</p>	<p>根據東路特委針對顧準所開的批評會，主要批評內容有二：一是在各級政權機構和黨委的工作關係上，過分強調政權機構的功能，有對黨委鬧獨立的傾向；二是擅自修改譚震林公開發表的文章，被認為是上下級關係中不正常的行為。⁶</p>
<p>蘇北時期 1941年9月 至 1943年3月</p>	<p>1. 1941年10月，被任命為鹽阜區財經處副處長。</p> <p>2. 1942年3月調任淮海區財經處副處長，並於7月兼任淮海銀行行長。</p>	<p>1943年3月，淮海區黨委處分顧準徒步前往延安學習改造，於10月間抵達延安。</p>	<p>1942年11月淮海區被日本軍隊大規模的掃蕩，顧準在與行署失去聯絡下，自承躲在友人家做消極的等待達一個多月，上級遂認為此舉是逃兵行為。⁷</p>
<p>華東時期 1943年3月 至 1952年2月</p>	<p>1. 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赴延安學習。</p> <p>2. 1945年9月離開延安。12月到達蘇北淮安華中分局，任華中財委委員，負責黨產工作，兼任立豐棉業公司總經理。</p> <p>3. 1946年6月出任蘇中貨物管理處處長；1947年7月轉往山東</p>	<p>1952年2月在三反運動中遭撤銷所有職務。</p>	<p>根據上海市委在1952年2月29日的說法，其公佈的理由為：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紀律，</p>

⁶ 顧準，《顧準自述》，頁78。

⁷ 顧準，《顧準自述》，頁88-92。

	<p>省，任山東省工商總局副局長。</p> <p>4. 1948年2月任渤海行政區行署副主任兼財辦主任，9月任山東財政廳廳長。</p> <p>5. 1949年2月進入接收上海財經工作的幹部隊，任青州總隊隊長；1949年6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財政局和稅務局局長，兼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p>		<p>違反黨的政策方針，在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雖歷經教育仍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並令其深刻反省。⁸</p>
--	--	--	---

資料來源：顧準，《顧準自述》，頁 21-213；羅銀勝、梁倩婷，《顧準畫傳》，頁 45-192；。高建國，《拆下肋骨當火把——顧準全傳》，頁 66-332。

透過上頁表格可以發現，顧準在每個時期的起點都相當的不錯，但最終結果卻都因為他的工作方式和行為與上級領導扞格不入，因而被迫以降職或撤職作收。探究其箇中原因，撰者以為，問題出在顧準本身鮮明的自主性和創造性與所處組織的結構功能不協調，進而導致他在每一時期都會與上級領導之間存在某種程度上的矛盾。若從中共各級組織的關係來看，其由上到下所呈現的是一種金字塔型的梯級結構，而這一結構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指導原則下，職能分工方式為：只有上級組織才有工作方式與政策法規等的決定權，下級組織只有服從、執行上級的決策和方針的職能。⁹要之，依據「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職能分工原則，個人與組織的關係自然就是個人服從組織，而組織的功能則是要完成上級組織的任務，組織中的個人職能就只是要執行、完成任務，絕非是進行任何自主的、創造的工作。

然而，顧準自主和創造的工作態度與方式使得他在組織工作中，往往會與上級領導發生歧見與衝突。舉例而言，1937年在主管中共江蘇省職員運動委員會時，面對著上海已被日軍佔領、淪為孤島的現實，該如何把金融、保險、洋行、海關、百貨店等的職店員組織起來的這一課題時，顧準不是利用救國會、救亡協會、戰時服務團等既存的社會團體，而是著眼於聯誼會、俱樂部等新式的大眾組織，在當時的上海租界，陸續成立了上海市銀錢業聯誼會、益友社、上海華聯同樂會、上海市保險業聯誼會、中國婦女俱樂部等為加深各界業職員之間親睦而組織的各式團體。這種聯誼會組織形式對外是友誼連絡、對內是互相交流、自我教育和文化娛樂，由於這一形式很適合上海職員的生活習慣，且為了動員職員們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更可以善加利用這些團體，顧準這樣的作法在加深黨與職員的

⁸ 〈為更進一步展開「三反」鬥爭中共上海市委舉行黨員幹部大會黎玉、顧準等四人思想惡劣阻礙三反被撤職曹漫之、程萬里等四人品質極壞被開除黨籍〉，《解放日報》，1952年3月2日，第1版。

⁹ 王貴秀，〈民主集中制的由來與涵義新探〉，《理論前沿》（北京），2002年第8期，頁8-11。

聯繫方面可說是取得了成果。¹⁰不過，這一工作方式卻遭到當時顧準的上級領導劉長勝的反對，最後顧準被降職到文委工作，而顧準的作法也被劉長勝斥為「聯誼會路線」、「顧準路線」，並在組織內部進行批判和清算。¹¹另外，當顧準在蘇南路東根據地時，對黨組織在根據地村莊工作中「民運同志包辦群眾運動」的作法表達不滿，就寫文章對之進行批評，還在自己的主管刊物上發表；對於根據地黨委權力過於集中的現象，他就強調實行行政權力機構的作用，這些對時局的反映當然就遭到他的上級領導譚震林的批判，最終顧準也被撤職調離該區。¹²最後，當中共建政後於上海主管財務與稅務業務時，顧準認為中央財政部所實行的「民主評議」徵稅方法有問題，便抵制這一政策而實行自己提出來的「自報實交、輕科重罰」辦法，結果這一衝突便成為他在 1952 年三反運動中被無預警撤職的重要原因。¹³

顧準這種自主和創造的工作態度與方式無疑源自於其在會計事業上的歷練與成就而來。如前所述，顧準是通過自學成才，年紀輕輕就已著作等身，並且受邀任職數所大專院校的會計講師，這樣的成就如沒有自主性的學習及工作態度是無法達成的。也正由於這些工作成果得到周遭同業的認可與讚賞，加以顧準在上海會計學界的地位快速竄升，遂使得他對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智識能力有了極大的自信與把握，進而形成自身的處事特質和人格特性。由此觀之，一旦顧準把他這種鮮明的個人特質帶到革命組織的工作中時，可以說這樣的特質是不被期待的，同時更是對上級組織與領導的一種侵犯和挑戰。猶有甚者，往往還會出現這種現象，亦即下級的自主行為越是正確，上級打壓之的主觀意圖就越大；下級的正確就意味著上級的錯誤，而這當然會危及上級領導者地位的鞏固與穩定。正因如此，「鋒芒畢露」的顧準才會在革命生涯過程中的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乃至不同的領導系統中，總是被懲處、被降職。顧準胞弟陳敏之便曾提過兩個故事，有助理解顧準個人特質與組織單位間的衝突。

¹⁰ 岩間一弘著，甘慧杰譯，〈1940年前後上海職員階層的生活情況〉，《史林》（上海），2003年第4期，頁41-53。

¹¹ 陳修良，〈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顧準〉，載於陳敏之、丁東編，《顧準尋思錄》（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頁289-297；高建國，《拆下肋骨當火把－顧準全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133-134。

¹² 「民運同志」係指上海下來的學生、工人或職員，被派駐到蘇區的村落當中進行政治活動，由於村子裡的一切事情都須經過民運同志，實際上，村里的黨政民一切權力，都集中在民運同志手裡，遂被顧準批評為這是「民運同志包辦群眾運動」的作法。參見：顧準，《顧準自述》，頁69、78。

¹³ 顧準，《顧準自述》，頁150-168。

1972年，顧準告訴我，「三反」以後，陳毅曾召開過一個座談會，藉以聽取黨內外各方面對「三反」中處理幹部的意見……一位對顧準受撤職處分起決定性影響的、也是某大區的負責人在會上表示：「如果顧準再不聽話，飯也不給他吃。」可同是這一位負責人有一次在他領導的大區的一個幹部會議上卻說：「像顧準這樣的幹部，我們這個大區內一個也找不到。」表面上看起來，這位大區負責人前後兩次的講話似乎是矛盾的，其實只要串起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是完全一致的：實際上他是在告訴你，承認你是有能力的，但必須服從領導這一點最根本的前提。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那你什麼都有了，否則飯也不給你吃。另外，1959年，我曾參加在杭州召開的全國基本建設會議（那時陳雲擔任全國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會後在回上海的火車上，陳丕顯（上海市委書記）向陳雲介紹：「他是顧準的兄弟。」在閒談中，談論到顧準，陳丕顯對陳雲說：「顧準就是不服用。」

14

不過，觀察顧準在革命隊伍中四上四下的歷程當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既然顧準自主和創造的工作方式與組織的紀律是相衝突的，導致他在上海與蘇南工作時期都遭遇挫折，或被降職、或被撤職查辦，在蘇北更是受到嚴重的處分，被罰徒步前往延安接受學習改造。但為何他以待罪之身自延安學習改造回來之後，在組織中的職位卻迅速上升了呢？

顧準去延安之時，延安正處在沸沸揚揚的整風運動之中。1943年3月，延安整風運動中最殘酷的「搶救失足者運動」尚未展開，運動呈現的是較為和平的形式。根據大陸學者高華的研究指出，延安整風運動雖發端於1942年，但它的真正起步在1942年以前的很長時間就已經開始了。1937年後在延安和其他根據地

¹⁴ 陳敏之，〈顧準和他的兒女們〉，載於陳敏之著，《我與顧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頁37-48。

秘密進行的「肅托」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是延安整風運動中「搶救」運動的先導和試驗；在1940年至1941年上半年延安各機關、學校便已公開進行了一輪對新黨員和從事白區鬥爭幹部的審幹運動；1942年夏秋之際，整風運動又開始了審幹、反奸的試點工作。¹⁵1943年4月始，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審幹逐步進入反奸、搶救，延安三萬多名黨、政、軍幹部全被捲入進去，「特務」、「叛徒」、「內奸」，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多，人心浮蕩、人人自危，一片肅殺之氣瀰漫於各機關、學校。但幸運的是，顧準來延安途中歷經了將近八個月的時間，直到十月份才到延安，此時，搶救運動的最嚴酷時期已屆尾聲。否則，以顧準在上海為資本家服務的會計業背景和過去在組織中的表現，他將毫無疑問地被劃歸為搶救的對象，就算他能夠僥倖過關，審訊的各種殘酷手段也會讓他活罪難逃。因此，顧準對於自己的晚到也是暗自慶幸的。¹⁶

由於整風運動已經處在和風細雨之中，顧準在延安時期雖然也經過審查，但他的生活相對平靜，而沒有受到任何衝擊。此外，顧準之前在根據地所遭受的種種指控，更是受到上級領導的力保與平反。首先，顧準在蘇北時期的「逃兵」行為被當時主管新四軍的陳毅解除了責任。在一次談話中，陳毅對顧準說：「淮海掃蕩，軍部事前得有情報，並電告淮海準備。淮海負責人麻痺大意，未做反掃蕩部署，你在這一事件中是沒有責任的。」¹⁷而對於顧準在上海時期調離職委並降職到文委工作一事，上海地下黨的負責人劉曉在找顧準談話時說：「1939年省委把你調離職委，當時正值我去重慶向總理匯報工作，是劉長勝負責決定的。」¹⁸此番話暗指劉曉並不同意劉長勝的擅自作主。本來，顧準之所以到延安是要檢討過去所犯的錯誤的，結果錯誤不僅被上級領導所化解，且顧準因擁有會計專業的技能，更是成了高級幹部賞識、吸收的人才，例如：陳雲負責的西北財經辦事處所開辦的會計訓練班，徵調顧準去當會計教員，並希望他能留在延安從事會計方面的工作；陳毅解除顧準在淮海掃蕩中的責任，主動關心他未來的工作意願；劉曉更是表達希望顧準能夠返回上海工作。¹⁹後來的發展表明，顧準的財經專長和能力受到相關部門和領導的重視，並成為上級急欲提拔和培養的專業人才。

由於會計等財經類特長在中共黨組織中是罕有的人力資源，就在顧準抵達延安不到半年的1944年春，中央黨校隨即調他到該校校務部去協助會計工作，主管校務經濟活動的核算與控制，他很投入且順利的達成任務，為此，校務部還送給他一條毛毯。²⁰同年夏天，陳雲負責的西北財經辦事處開辦會計訓練班，又調顧準去當會計教員。另外，顧準也主動針對延安邊區財經問題進行調查研究，走訪邊區財政機關和公司企業，期間經人介紹給當時黨內主管財經的最高領導人陳

¹⁵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前言〉、〈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階段發展：審幹、反奸與搶救運動〉。

¹⁶ 高建國，《顧準全傳》，頁190。

¹⁷ 顧準，《顧準自述》，頁105-106。

¹⁸ 顧準，《顧準自述》，頁112。

¹⁹ 顧準，《顧準自述》，頁105、113-114。

²⁰ 顧準，《顧準自述》，頁109-110。

雲認識，陳雲對顧準的專業予以肯定，甚至邀請顧準留在延安工作。²¹1945年對日抗戰結束後，顧準被列為上海地下工作的幹部而離開延安，當他抵達蘇北淮陰根據地稍作逗留時，又被當時擔任華中分局組織部部長兼財委主任曾山留下委以重任，而後更成為解放後上海第一屆人民政府的要員。人生的際遇本來就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原本是因為犯了錯誤而被罰到延安去參加整風，如今不僅逃過被批鬥的命運，自己的仕途更是步步高升，對顧準來說，他顯然對自己的發展感到相當吃驚，並且明顯發現自己工作中的環境氣氛產生很大的變化，「（自延安）回來時不論是熟人還是才認識的同志，對我都十分熱誠，似乎我的身價突然提高了許多。」²²

由上觀之，高層領導對顧準的賞識和認可，使得他自抵達延安之後反而開啓了他在革命與仕途生涯的上升期，甚至連顧準都對這一階段好的開始感到受寵若驚。不過，命運對顧準來說就是這麼曲折多舛，儘管有高層的提拔賞識，並且在革命隊伍中已有一定的經驗和資歷，顧準最終仍在革命成功不久後，隨即從其仕途上重重跌了一跤。自此以後，命運之神就不再眷顧顧準，1952年三反運動遭無預警撤職，1957年反右運動被打成右派並且開除黨籍，再也沒有遇到任何新的轉機與偶然。

總之，1952年三反運動以前，顧準在革命道路上的屢次落馬並沒有因此阻斷他對革命事業的嚮往，畢竟以顧準在上海會計界所享有的地位與聲望，職業上的成功的確提供他一個很好的避風港，但顧準仍舊堅持對於革命的信念而沒有動搖。究其原因，顧準自信而倔強的個人特質是其一，然以馬克思主義進化論為框架的線性世界觀，更能夠解釋顧準何以在革命生涯中屢不改其志的根本所在。因為相信馬列主義是科學的真理，認可它是歐美國家現行體制外的另一種政治選擇，並且能夠用來拯救和改造中國，正是這樣激進且理想的情懷，顧準方能認為，革命隊伍中的一時失敗純粹是個人因素問題，以馬克思主義所建構的藍圖和方向是大致無誤的。

第二節 進入中央黨校：沉潛修業

如前所述，顧準在三反運動之前的屢次挫折並沒有使他萌生退出革命的念頭，反思也著重在個人自省，對於革命的方向和目標絲毫未曾動搖過。不過相對前幾次的失敗，三反突如其來的撤職卻對顧準造成極大的衝擊和震撼，原因有二：首先，顧準在撤職前一天還在自己的辦公室忙於上海的財經和五反等領導工作，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被宣佈處分，以致當上海市委負責人之一的陳丕顯

²¹ 顧準，《顧準自述》，頁110。

²² 顧準，《顧準自述》，頁118。

詢問他對處分的意見時，他直率地表示：「感覺十分突然。」²³其次，撤職理由不清楚。三反運動的宗旨本來是以反對貪汙受賄和腐化墮落為內容的政治運動，但以當時上海市委針對顧準所做的指控：「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無紀律，違反黨的政策方針。」²⁴對照發動三反運動的原旨，還是它的實際操作內容，由上海市委所列舉顧準的錯誤，無論事實與否，都是風馬牛不相及。易言之，就算上海市委列舉顧準的罪狀屬實，卻也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這些都不屬於三反運動要反的內容。實際上，在此會前，顧準在所屬單位的三反運動中已經安全過關，何以這時又因三反而撤掉顧準的職務？或許正是顧慮到了這一點，在《解放日報》上公佈處分顧準等幾人的消息時，標題上所列出的原因才會是「思想惡劣阻礙三反被撤職」。儘管前文曾論及顧準自主和創造的工作態度與方式，使得他在組織工作中往往會與上級領導發生歧見與衝突，不過對比此次撤職原因，就算顧準針對稅收工作的觀點不盡合理，但他與領導之間的爭論也只限於方法，他雖善於獨立思考，也許確也有點驕傲自大的表現，然而以之「上綱」為反黨，確實匪夷所思。²⁵

²³ 高建國，《顧準全傳》，頁 323-327；陳敏之，〈我所知道的顧準與「三反」〉，載於陳敏之著，《我與顧準》，頁 22-26。

²⁴ 〈為更進一步展開「三反」鬥爭中共上海市委舉行黨員幹部大會黎玉、顧準等四人思想惡劣阻礙三反被撤職曹漫之、程萬里等四人品質極壞被開除黨籍〉，《解放日報》，1952年3月2日，第1版。

²⁵ 針對顧準在三反運動中遭撤職的原因分析，說法主要有三：一是顧準本人的分析，他認為撤職原因是與「稅收方法」之爭有關。這裡所謂的「稅收方法」之爭，是指顧準任上海財政、稅務局長時，拒絕實行當時中央財政部主張實行的「民主評議」的稅收方法，而堅持在上海實行「自報實交，輕稅重罰」以及其後改進為「專管、查帳、店員協稅」的稅收方法。為此，在1949年10月至1951年3月間，顧準與中央財政部進行了幾個回合的激烈的爭吵和對抗。陳敏之、羅銀勝、高建國等人亦持相同看法，參見：顧準，《顧準自述》，頁 150-168、209-213；陳敏之，〈我所知道的顧準與「三反」〉，載於陳敏之著，《我與顧準》，頁 22-26。二是當時上海工商界曾流傳這樣說法：顧準因「功高震主」、個人野心膨脹，公然宣稱：「三年之內當市長，五年之內當總理。」顧準本人則堅決否認他說過如此離奇的話，並且也曾在其〈歷史自述〉中寫道：「這句話流傳了很久，其實絕不符合事實。」「要當總理之類，不僅沒有說過，更未想過。」參見：高建國，《顧準全傳》，頁 329-330。三是近來大陸學界根據官方解密檔案所做的研究指出，顧準被撤職是因他在執行政策時「過左」。例如剛出版的《竺可楨日記》中，據竺在1957年9月5日的日記記載，顧準「在1952年的三反時期走左傾路線，主張以沒收辦法來消滅資本主義，被批撤職。」另外，楊奎松從已公佈的相關檔案中印證這一說法，就在顧準被撤職後第三天，1952年3月3日，當時在上海負責指導五反工作的薄一波給毛澤東及中央的一份簡報中說：「上海少數同志（如顧準等）有趁此機會把大資本家而且是比較靠近我們的大資本家……一齊打掉實行『社會主義』的想頭。」若從顧準的日記和自述中找他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態度，顧準在自己的日記中表明，在1949年時，他對黨的聯合資產階級政策是表示懷疑的。再從工作實際上看，在他主管上海財稅工作期間，他更多地是主張稅收來與資產階級進行限制反限制的鬥爭，其所實行的「自報實交，輕稅重罰」將使稅收成為對付資產階級的有力武器。「自報實交」在實施中的確存在資方為提供逃稅漏稅的方便的可能，但是，由於有「重罰」一項，在實施過程中，就隨時可以從嚴入手，嚴厲制裁資產階級。因此，顧準在「三反」中被撤職即有可能是因為他在「五反」運動中有「過火」的思想與行為，可是為何卻不直接公佈這個原因呢？現在並無法找到具體的檔案資料來詳細說明，但是，從當時的政治形勢和中共對資產階級的政策來分析，不如實公布或許是顧慮到正在全中國轟轟烈烈進行的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參見：樊洪業〈竺可楨日記裡的顧準〉，《南方周末》（廣州），2004年12月2日；楊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運動始末〉，《社會科學》（上海），2006年第4期，頁 5-30；蔣賢斌，〈顧準在「三反」運動中被撤職原因的分析〉，《二十一世紀》網路版（香港），總第 77 期，2008年8月。

由於撤職宣佈太過倉促且帶著莫須有的罪名，顧準一時之間的確無法接受，他在自述中提到這段過往：「2月28日撤職以後，閉門家居二三個星期，除寫成一份報告而外，別無所事。心情煩亂，情緒消沉，什麼事也做不成，常常竟夜不能成寐。」²⁶但同時，顧準對這次撤職萌生一種「黨內沒有民主」的強烈不滿情緒，²⁷以往失敗都將原因歸咎於個人的他，這次反而積極提出申請，請中央重新複查，儘管中央兩次駁回複查的請求，卻也在申請過程中激發他去探究「黨內沒有民主」此一質疑的動力，並且成爲他在學理上追究問題的一個現實的個人動機。因此可以說，三反撤職實際上標誌著他自青年時代以來所追求以職業革命家爲職志的革命生涯的終結，並且促使他對政治開始產生疏離感，轉而對學術心存嚮往。撤職事件近一個月後，顧準找了幾本初等幾何開始學習數學，他說：「我從幾何學中發現了嚴密的邏輯論證方法，覺得除階級鬥爭、政治工作而外也還『別有天地』。」²⁸

不過在1952年三反的撤職之後，顧準並沒有完全放棄實際政治工作的想法。同年6月，顧準被重新分發到正在籌建中的華東建築工程部任辦公室主任，1953年3月，上調到中央建工部財務司擔任司長一職，1954年在被派往洛陽協助進行一建設工程時，卻又因故失敗，並且受到黨內警告處分。²⁹對於這次的業務疏失，顧準將過錯與責任一肩攬起，同時他的身體狀況也出現警訊，他很清楚地認知到，在三反問題解決不了的情況下，自己已是不適宜也不可能再從事第一線的實際工作。因此，他提出進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的申請。

1955年9月，顧準進入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進行爲期一年的學習，一開始顧準仍抱持「申訴委屈和解決問題」的想法，³⁰即試圖解決個人與組織間的衝突問題，再看自己未來在實際工作中是否仍有大展鴻圖的可能，這樣的目的可以說是純爲抒發個人不平之鳴的，而尚未涉及對主義、革命、體制、國家、社會等宏觀面的探索。但同樣是在黨校這段時期，最終使顧準產生全盤顛覆性的衝擊和發問，則是導因於1956年赫魯雪夫在二十大秘密報告的揭露，它使顧準對於自青年時代以來的革命信念產生了幻滅。

前文探討青年時代顧準思想逐漸左傾，最終更把希望的目光轉向共產黨，主要原因除了馬克思主義當中的理想主義元素深深地吸引了他，驅使他走上共產革

²⁶ 顧準，《顧準自述》，頁212。

²⁷ 顧準，《顧準自述》，頁315。

²⁸ 顧準，《顧準自述》，頁212-213。

²⁹ 顧準此番在洛陽工作的受挫，起因於兩次「浪費事件」：一是冬季施工要用大批保暖材料草蓆子，但顧準手下一工作人員在所需預算上多加了一個0，造成了大量的浪費；二是在顧準主張下，建築部隊的一個團修築了一條廠區的道路，觸怒了施工組織設計中負責施工運輸設計的蘇聯專家，被其批評貿然築路且路修得太寬，同樣是一種浪費行爲。參見：顧準，《顧準自述》，頁223。

³⁰ 顧準，《顧準自述》，頁225。

命的道路；另一個就是來自於蘇聯社會主義和史達林的魅力。顧準曾說：「30年代初期我思想開始轉變，走上革命道路的時候，蘇聯的影響，史達林的影響，是極其重要的因素。」³¹「蘇聯和史達林的形象，對於我多少是聖潔的。」³¹在初進到中央黨校學習時，顧準對於馬克思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世界觀仍舊沒有任何的質疑和反思，若查照1955年9月到1956年1月間顧準的日記可以發現，他大量閱讀馬恩列史毛的理論著作，對他們的理論充滿信服和崇敬之心，更為自己進一步理解或掌握他們的理論要義而高興。³²另外，對於當時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更是感到由衷的高興，1955年10月29日，在聽了喬冠華演講列舉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兩方的實力消長對比，想到社會主義的一片大好情勢，竟然興奮的無法入眠。30日，在報上看到毛澤東的談話說中國資本主義存在不會超過1959年，以及中國鐵路建設的好消息，中午依舊睡不著覺，心裡很興奮地想著中國的進步速度問題。而在11月2日看了一部蘇聯的電影之後，顧準記錄下他看完後的觀感：「整個來說，這是歡樂，這些歡樂應該拿到西歐去，去影響一下歐洲人，讓他們知道他們是快活不出來的。」³³由此觀之，這段期間的顧準對於蘇聯聖潔形象和社會主義發展仍抱持著極為單純的美好憧憬。

然而，1956年赫魯雪夫在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卻徹底衝垮了顧準對於蘇聯、史達林乃至社會主義理想的聖潔感，進而產生全盤性的否定與質問。顧準是在黨校聽傳達赫魯雪夫的報告，並且在自述中對於這樣的心境轉折做了很詳細的描述：「我現在還記得那時的景象—那是一個晚上，傳達人是黨校一個不重要的工作人員，他只是照本念這份報告，念完就散會。念報告不加評語，念完後對學員不提任何討論或批判這個報告的要求，聽完就算完事。念報告時會場十分沉寂，散會時大家都沉默無言。」³⁴對顧準而言，過去史達林在他心中的形象是聖潔的、無私的、偉大的，但如今他自承已從「聖潔」落為「嫌惡」，並且「對革命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幻滅』之感。」³⁵

於是，就在聽完秘密報告後不久，顧準又看了一部蘇聯自製關於農村生活的電影。在日記中，他寫道：「昨晚看蜻蜓姑娘這個電影。那個電影把蘇聯的農村美化到什麼程度喲！別墅式的住宅、城市式的居民點，可以修建百萬盧布的文化宮，動物園式的養鴨場。一年只能獲得四五百億盧布現金收入的蘇聯農村，決然做不到這一點。」³⁶至此，顧準對蘇聯一切事物天真浪漫的看法已變得現實許多，並且轉化為批判和理性的推理。更甚者，顧準對於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革命亦不再抱著無條件肯定的態度，正如他自己所說：「其實，二十次代表大會又何曾僅只

³¹ 顧準，《顧準自述》，頁241-242。

³² 顧準，《顧準日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2-42。

³³ 顧準，《顧準日記》，頁12-14。

³⁴ 顧準，《顧準自述》，頁230。

³⁵ 顧準，《顧準自述》，頁230。

³⁶ 顧準，《顧準日記》，頁78。

批評了斯大林。只要是打開大門，放進清新空氣來，一切問題都要重新評估……只要我們承認『歷史的繼承性』這一原則，承認相對真理到達絕對真理無論如何不是一個天才獨立完成的，承認歷史上許多人投了一些『小粒子』到寶庫中來。」³⁷正是這樣「一切問題都要重新評估」的世界觀的轉變，顧準開始不再執著於對馬克思和共產主義的盲目崇拜，逐漸加入了理性的思考批判，而後他的思想才會觸及到根本和全盤性的革命反思。

對顧準而言，赫魯雪夫對史達林否定的報告可以說為他開啓一個出口，一個在三反後陷入長達四年的尋求解決問題和情緒低潮的出口。過去因為世界觀的影響和有關知識的侷限，顧準在思想上的反思最多只能達到「黨內無民主」的高度，且反思目的也純粹是以個人利益為導向。如今，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全盤否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史達林作為一種歷史、主義、價值和秩序的象徵符號就此崩解了，同時也是對史達林在世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路線方針、價值理念、政策行為等等的否定。

當一個「聖潔」的史達林不復存在，甚至在顧準日記中更直指史達林是一個「殺人兇手」，³⁸顧準心中已悄然播下了日後從事學術研究的反思土壤。1956年9月，顧準結束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一年的課程，來到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經濟研究所，從而展開他歷經苦難的思想探索生涯。

第三節 轉往經濟研究所：學術探索的開啓

1955年秋天進中共中央黨校沉潛學習時，顧準即盤算著利用這一年「考慮下半年如何過去」的問題。他在9月23日的日記記載著：「我們的思想界還是十分貧乏的。」³⁹儘管他仍抱著有朝一日回到實際工作崗位中一展長才的希望，但語意中已微微表達出轉往學術研究的可能性。且因為兩次提出三反撤職原因的複查總是無疾而終，對於未來前途感到惴惴不安，加上赫魯雪夫秘密報告所帶來的探索推力，使顧準堅定轉往研究單位從事探索工作的信念。由於顧準在黨校學習期間表現出對經濟議題的關注，以及與耿超白和孫冶方等人的交流，顧準遂決定爭取調入到中科院經研所擔任專職研究員。⁴⁰為了進入經研所，顧準一方面與主管領導人周旋對抗，方能順利離開原先隸屬的建工部，⁴¹另一方面則是寫信給陳毅和胡喬木請求幫助。⁴²直到進入該所後，他又力辭中科院領導張勁夫要他擔任副

³⁷ 顧準，《顧準日記》，頁 51-52。

³⁸ 顧準，《顧準日記》，頁 69。

³⁹ 顧準，《顧準日記》，頁 4。

⁴⁰ 高建國，《顧準全傳》，頁 378。

⁴¹ 顧準，《顧準日記》，頁 96-97。

⁴² 顧準，《顧準自述》，頁 211。

所長的要求，執意不願重返仕途，而只想專門從事研究工作。⁴³幾個月後，當他無法二次推辭參加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負責自然資源的考察工作時，仍再三要求兼任經濟所研究員。⁴⁴而在 1957 年反右運動中被打為右派，並且之後四年下放農村勞動，1962 年 5 月，已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顧準，又想方設法的重返經濟研究所。由於堅定「走進書齋」的信念，讓顧準無論如何都想要在經濟研究所安頓下來，正如他的日記所言：「如果有機會做研究工作的話，必須死心塌地地鑽研下去，並且決心窮畢生之力來做這件事。」⁴⁵只是，顧準此一決定最終所付出的代價卻是巨大的，迫使他必須在體力勞動與思想探索之間奮力掙扎。因為，往後他所要研究的一系列問題的問題意識和研究主題，以及所需的知識和研究方法、甚至是所得出來的結論，都將不見容於所處的政治風氣和學術主流，在那個政治無限上綱的時代中，顧準個人的生命與他所生活的政治世界是分不開的，故其研究所得出的內容將無可避免的被視為異端思想。於公，顧準在 1965 年再度被打成右派；於私，他徹底被逐出家門，妻兒更是與其劃清界線、斷絕關係。不過，顧準到生命盡頭時仍在思想，在其身後方能有豐富的思想成果問世。因此，他的生命與其說是「因蒙難而思想」，倒不如說是「因思想而蒙難」。⁴⁶

1956 年 9 月，顧準來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此後的時間，雖然曾一度離開到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工作，也曾數度下放農村勞動，但他的單位一直都掛在中科院經研所。綜觀顧準一生著述繁浩，但其主要思想成果都是在他所屬單位——經濟研究所——任職期間所完成，究其原因有三。首先，顧準的工作單位——中國科學院是全中國管理科學研究的最高機構，在當時專制政權極力管控民間閱讀文化的情況下，此一單位卻可以佔有極其豐富的學術理論資源，甚至可以接觸到大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術思想和理論。回顧中共大規模出版內部讀物的歷程共有兩次：第一次是在 1960 年代初的中蘇論戰期間，由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等，有計畫地出版了一批國際共運中各種思潮流派和他們認為有助於了解蘇聯修正主義、西方資本主義的著述及文藝作品。第二次則是在 1970 年代初期，隨著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中蘇關係的緊張和中美關係的解凍，中共也不得不鬆動一下水泄不通的出版界，開始舉辦《摘譯》(1973—1976)，介紹國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潮及文藝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參閱和批判」的蘇修理論和文藝作品，以及和中美關係有關的歷史傳記等。⁴⁷這些內部讀物也稱「皮書」，係中共高層出版發行的僅供內部參考的翻譯著作，在當時文化禁錮的年代，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文學藝術以及社會科學著作，是作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因此，內部讀物的出版是一項配合反帝反修鬥爭的重要政治任

⁴³ 羅銀勝，《顧準的最後 25 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頁 94。

⁴⁴ 顧準，《顧準自述》，頁 233-235。

⁴⁵ 顧準，《顧準日記》，頁 63。

⁴⁶ 裴毅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人性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 295-297；林賢治，〈讀顧準〉，載於陳敏之、丁東編，《顧準尋思錄》，頁 84-90。

⁴⁷ 宋永毅，〈文革中的黃皮書和灰皮書〉，《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42 期，1997 年 8 月，頁 59-64。

務。⁴⁸內部讀物按其內容性質的不同，又可分為兩大類：黃皮書為文藝書籍，灰皮書則為政治書籍。⁴⁹由於顧準在中科院工作，上述這些內部讀物應該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他在1960年代初期先後翻譯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和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的《經濟學論文集》，顯然就是為了配合中央「內部讀物」出版計劃所參與的翻譯工作。也正是憑藉這種學術理論資源方面得天獨厚的優勢，顧準方有可能進行理論探索。

再者，顧準在中科院得以一個人獨自進行思想學術探索，也和中共建政以來逐漸落實的單位制度有關。單位是中國所特有的一個社會組織形式，其為國家所有，受國家行政組織控制，由政府勞動人事部門管理，具有統一的福利制度組織。⁵⁰它的前身是戰爭年代共產黨根據地的黨政軍機構，成員受控制的程度很高，任何活動都須納入行政當局的控制中，甚至連隱私權也很難存在。隨著中共在全國不斷取得軍事勝利，其根據地的政權系統也向全國範圍擴展，這種特點在新佔領地區仍被保留下來，人們的就業場所就同時成為他們參與政治和社會過程的主要場所。⁵¹而單位作為當代中國的一個基本的社會實體，在社會中的作用與傳統社會的家族有相當一致的功能，都具有相似的內部權威認同機制，甚至擁有相同的「封閉性主權」，也就是說諸多信息都被封閉在家族和單位內部，問題也最好在結構內部得以化解，而不是移到結構外部。這樣，單位與家族一樣就能夠對自己的成員起到某種「保護性」功能。⁵²同時，由於單位具有功能的合一性、要素主體的非契約性和資源的不可流通性，加上傳統習性上中國人對家族的路徑依賴，單位遂逐漸深化成為家族式團體，在這一團體中，重視「人際關係」是其一大特性。⁵³依此而論，顧準所處的單位——中科院經研所，由於他與單位領導和所內同事都有很好的互動，因此有利他每當政治情勢比較不是那麼緊張時，還能夠潛心學術而不受外界紛紛擾擾所影響。

顧準來到中科院經研所工作時，相對而言有一個很好的人際關係網絡。1956年第一次進入中科院時，院裡的領導張勁夫是顧準在上海救國會工作時的同志，所以當顧準進入經研所時，他便堅持要顧準擔任經研所的副所長；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後重回經研所，換成是顧準的好友孫治方擔任該所領導，據顧準的忘年之交吳敬璉說：「他（顧準）和孫治方是生死之交，孫治方對他是非常尊重的。所

⁴⁸ 佚名，〈曾經影響了中國一代人的「內部讀物」〉，《新華網》，2007年12月11日。2009年1月19日，取自：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7-12/11/content_7228164.htm

⁴⁹ 王曉建，〈中國「內部書現象」〉，《北京日報》（北京），2006年7月3日。

⁵⁰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60。

⁵¹ 路風，〈中國單位體制的起源與形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總第5期，1993年11月，頁66-87。

⁵² 劉建軍，《單位中國：社會調控體系重構中的個人、組織與國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頁14-18。

⁵³ 路風，〈單位：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中國社會科學》（北京），1989年第1期，頁71-88。

以只要孫當所長，還能保護他。」⁵⁴正因為孫冶方身為該單位的領導，顧準才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與協助。此外，中研院網羅許多著名學者、已退休的高級幹部在這個單位，例如中共前總書記張聞天就是在經研所擔任研究員一職，因此內部成員的思想豐富、背景多元，更促成這一單位自由而活潑的學術氛圍。

最後，單位又可分為機關單位、企業單位和事業單位。所謂事業單位指由行政部門領導，從事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及社會福利等服務活動的機構，其中，知識分子主要集中在事業單位。⁵⁵中科院就是一個收納高級知識分子且具有專業技術性的單位，它對成員的專業知識要求自然很高，如此一來，將會使這種單位相對而言更注重成員的智識能力，同時也會在單位內部型塑出一種智性競爭的氣氛。以文革期間為例，雖然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的學習氣氛受到極大衝擊，但相對其他單位而言，其中的成員仍然較為重視學術與理論的研究。因此即使在單位的五七幹校或是農場勞動時，單位都設有圖書館，且在勞動改造期間，成員也都帶有不少書籍，而相互間的交流自然也就和學術研究有關。因此，在這樣具有學術與研究氛圍的環境中，是相當有利顧準學習與思考的。

1956年與1962年兩度進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象徵著顧準人生志向的重大轉折，即從官場走進書齋，成為一名立命研究的思想家。不過他的人生苦難卻也隨之接踵而來，1957年反右運動中，顧準被劃歸為右派分子，對已經開啓探索、反思之路的他，從此就要在體力勞動與思想探索間奮力掙扎，並且伴著生理與心理上的苦痛走向人生盡頭。

第四節 反右運動後的人生磨難

1957年8月，進入中科院甫滿一年的顧準受到反右運動擴大化的波及，並且在1958年4月正式宣佈被劃為右派分子與開除黨籍，其罪名是：鳴放期間對黨惡毒攻擊、對右派言行深表同情、自1935年入黨以來，長期對黨不滿，向黨鬧獨立性，屢犯錯誤，屢教不改。⁵⁶但這一次，一再被政治玩弄於股掌之間的顧準卻說，他心裡和思想上是平靜的，⁵⁷因為此時的他已決定未來要進行研究與探索，面對這樣重大的政治處分，或許僅僅象徵著仕途的終結。因此，他不再有像1952年三反運動被突然撤職時，那種激動難寧的反應。

⁵⁴ 邢小群，〈思想使人受難，受難使人思想—吳敬璉談故準〉，載於陳敏之、丁東編，《顧準尋思錄》，頁350-361。

⁵⁵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頁60-61。

⁵⁶ 〈中國科學院揭發黨內右派分子顧準〉，《人民日報》，1957年10月7日，第3版。顧準在其《自述》中列舉外界所揭發的罪行則為：一、在上海工作時期犯錯；二、反蘇言論；三、惡毒攻擊毛主席和其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言論；四、喪失階級立場；五、其他。參見：顧準，《顧準自述》，頁248-249。

⁵⁷ 顧準，《顧準自述》，頁250。

從 1957 年 8 月被打成右派到 1959 年 3 月被派往河南省商城接受監督勞動之間，顧準雖然必須接受不間斷的批判以及在 1958 年 5 月下放到河北省贊皇縣勞動，但因為生活和讀書仍有基本保障，顧準於是閉門家居，除了在宿舍房前開一小片土地種蔬菜外，全部時間都用來讀書。儘管背負著右派分子這個人人得而誅之的身分，但顧準卻是過著一種帶有樂觀情緒且寧靜的探索生活，因為從 1957 年夏季的反右運動到 1958 年大躍進的開展，中共在政治與經濟上越來越左傾的政策路線，在顧準眼中看來絕對是錯誤的，而它們反過來證明了他的探索方向的正確性。從顧準的日記當中可以得知他對大躍進的看法，例如，他將 1958 年正值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形容成「刮了一陣共產之風」，並且比喻為「痙攣」。⁵⁸顯然，錯誤的政策和景象就是對他獨自探索所得成果的肯定。另外，1959 年 3 月，就在他即將下放河南省商城縣勞動前夕，當他得知了第二次鄭州會議，與會領導人如毛澤東已知道大躍進中的大兵團作戰，搞得人困馬乏、勞動生產力下降，弄虛作假的情形異常嚴重，並且決定要整頓一下人民公社，尤其要煞一下平均主義的共產風。⁵⁹這一會議使顧準更加堅定要投入研究探索，樂觀地稱自己是「勝利的人」，對於即將到來的下放勞動則說：「這個時候下去是好極了。土地多濕潤！豐收有希望。春播之前改變政策還來得及，遲了就不行了。」⁶⁰

1959 年 3 月到 1960 年 2 月，顧準被遣送到河南省商城縣進行勞動改造。原先被分配到西大畝縣國營農場，1959 年 6 月則轉往鐵佛寺水庫勞動隊。顧準在這個勞動隊勞動和生活了六個多月，可以說身心皆歷經了一段痛苦煎熬的日子。在他的《商城日記》中，大量記錄了大躍進期間所面臨饑餓的威脅、疾病的折磨、失去親人的悲痛，並且深刻表露出當時被迫檢查交代、高強度體力勞動、沒有讀書寫作的時間和條件的苦惱。顧準在日記裡表明一種態度：即在這樣物質缺乏的困頓時期裡，學會如何生存自保是非常重要的技能。來到勞動隊前兩個月的生活還過得去，勞動強度不高，飲食與生活尚不受各種戒律所限制，因而過著「不像改造樣子」且「不用腦子」的右派「大老爺」生活。⁶¹但緊接而來的政治批判和自然災害開始帶來的食物短缺，顧準開始覺得恐怖而屈服了，他體認到，如果要苟全性命地熬過這段苦難，最終能活著見證並記錄下這段荒謬的歷史，勢必要與勞動隊的隊長沈萬山建立好關係。於是，他一方面堅持帶病勞動、「重活搶著幹」以爭取好的印象；另一方面則是學會「唾面自乾、笑靨迎人那一套」。且要求自己將這一套「逢迎」形成自然，「每見沈必招呼，他不瞅不睬我也招呼。」這一笑靨迎人政策最終得到效果，沈萬山公開表揚顧準，說他「接上了頭」。⁶²同時，顧準緊跟當時的政治風氣，作為右派分子的他必須參與各種批判會、鬥爭會，要經常寫思想檢查、交待材料，從中得出一種心得：「愈是要靠攏黨，愈要暴露，

⁵⁸ 顧準，《顧準日記》，頁 128。

⁵⁹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726-728。

⁶⁰ 顧準，《顧準日記》，頁 128-129。

⁶¹ 顧準，《顧準日記》，頁 245-246。

⁶² 顧準，《顧準日記》，頁 138、143、165、245。

暴露愈多，愈是進步，不暴露不能過關。」而爲了用這套「暴露法」討好上級，他更設計一套「環繞人道主義，蔓延及於先進吃虧論」的寫作提綱，藉此精心的批判自己過去的錯誤。也唯有透過這些行動與技巧，才使得顧準在勞動隊裡的處境沒有更加惡化，甚至還有了改善，例如他在幹部的批准下搬到外廚房臥室，「那兒屋小，暖和，晚上可看報，沒有人在那兒開會，早上可以早起烤火，越冬是個好地方。」⁶³

對具有鮮明個性且自視甚高的顧準而言，這種彷彿過著雙面人的勞改生活，內心自然也是充滿掙扎與痛苦的。在其日記中便提到：「精神折磨現在認真開始了，思及生活像泥污，而精神上今天這個人，明天那個人來訓一通，卑躬屈節，笑靨迎人已達極度，困苦嫌惡之感，痛烈之至！」而處在大躍進轟轟烈烈的勢頭上，顧準還需面對大躍進在農村中製造的飢饉，「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爲食物的慾念所苦……想如何『搞』點紅薯與葫蘿蔔吃。想回家如何盡情大吃一個時期。烤白薯北京很難買到，窩窩頭是美味……想這些事，竟至不能入寐。」此時已因飢餓、營養不良而發腫的顧準，除了在精神上難以調適外，眼前更重要的就是克服作爲人最基本的生存問題。於是，他不得不尋找各種食品來源的途徑，甚至更學會了偷，他說：「前幾天，曾出現過一些衰弱與卑微之感。卑微是從千方百計僅求一飯來的。日夕奔走於食品店與蔡璋之門⁶⁴，費盡心計計算時間到招待所吃二碗飯之類，覺得這個人變下流了。」並且自問：「我是否變得卑鄙了？我偷吃東西，我偷東西吃，我不如青年有奉獻精神。」⁶⁵

然而，顧準對這種自己也鄙視的行爲所持的理由是：「哀鴻遍野，我努力求飽，有些說不過去。但我要恢復我的精力，節用我回京的時間。我還要工作，我要保存自己。我還要戰鬥。而這個戰鬥不會是白費的，至少應該記下一個時代的歷史，給後來者一個教訓。」顧準在《商城日記》中曾多次提到 Stalinism（斯大林主義），他眼中的斯大林主義是錯誤、極端且具有破壞性的，同時認爲中國現在所走的政策路線正是斯大林主義。但是，爲何如此錯誤的政策路線會成爲一種政治狂熱，而沒有人勇於站出來反抗呢？對此，顧準指出斯大林主義在中國還是有生命力的。⁶⁶他期許自己：「應該承認，Stalinism 是今天的時代思潮，我必須充分懂得這一點，以此爲根據來決定我的行動。同時也應該記錄到歷史中去。」「新局面開始前，沉默自全，跟著走，記錄歷史，使這個時期的真相能爲後世所知。」

⁶³ 顧準，《顧準日記》，頁 151-152、158。

⁶⁴ 此處的「蔡璋之門」，「蔡璋」係顧準在商城縣勞動時的勞動隊友，顧準在日記中多次提及他是個「大滑頭」，亦即他儘管身處艱困的勞動生活，卻自有一套方法虛應繁重的體力勞動和思想批判，顧準對他的評價是：「聰敏伶俐，可惜用得不當，毫無傻氣。」另外，不知透過何種管道，蔡璋常有機會收受額外的日用生活品，由於顧準和他相處不惡，有時可以從他那兒購買或經餽贈取得點心食用。因此，顧準在此處所提到的「蔡璋之門」，就是指他在物質生活極端困頓的大饑荒期間，還能額外取得食物的管道之一。參見：顧準，《顧準日記》，〈商城日記〉。

⁶⁵ 顧準，《顧準日記》，頁 152、168、226-227、236。

⁶⁶ 顧準，《顧準日記》，頁 226。

綜上所言，受限於環境與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顧準告訴自己可以做一個「歷史觀察家」。爲了能夠利用不多的時間記錄這段歷史並且還能探索研究，他不得不在這場政治運動中尋求自保的方法，亦即「有意識」的撰寫歷史交代和思想檢查的材料來謀求過關。因爲他堅信，這樣的極左政策是如此的錯誤，反過來證明他的探索方向的正確，且仍樂觀地以爲新的局面肯定會到來，如同他在日記中所述：

我不忍參加這個剿滅人口的向地球宣戰的戰役，然而中國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可走。這個戰役不會長期繼續下去，結果必將以坦率、開明、寬恕、人道主義、文明的方向來代替目前的用說謊、專制、嚴刑峻法、無限制的鬥爭、黑暗的辦法來完成歷史的使命。⁶⁸

1960年1月，顧準熬過了大饑荒的苦難回到北京，並且在1962年5月摘掉了右派帽子，隨後更重返中科院經濟所。從商城回到北京後，顧準在日記中曾經寫道：「探索要繼續，思想要提高。」但「態度必須繼續卑微下去。」⁶⁹儘管隨後在1964年四清運動中再度被劃成右派，並且又面臨到文化大革命的不利局面，但顧準已能確實運用在商城所學到的在政治運動中自保的技能，亦即充分暴露自己的「錯誤思想」，深刻地書寫「歷史交待」和「反省材料」。回顧顧準人生最後十年的際遇，可以發現，在更爲猛烈的政治風暴中，他的處境並沒有比原先還要來得惡劣，也因爲有這樣狹小的自由生存與思想的空間，讓顧準得以繼續進行著獨自的探索，並把研究成果或用通信方式告知陳敏之、或是用讀書筆記的形式記錄下來。不過，自從顧準在1964年再度被打成右派分子後，儘管免不了要接受思想批判和勞動改造，但對他而言最苦、最難熬的反而是骨肉親情的折磨。1965年，與顧準結縈近30年的妻子汪璧和他離婚，子女們也都與他脫離了父子關係，汪璧更因文革間遭受極大的精神壓力走上自殺一途。面對妻離子散的局面，加上對家人的思念使得顧準在情感上受到很大刺激，使他常在深夜裡失聲大哭、淚痕印枕，因爲他自此已經是一個無家可歸、孑然一身的寡人了。⁷⁰

大致而言，顧準自1957年以後就一直處在顛沛流離的生活直至因病辭世，但可以看到，他一直試著在「如何生存自保」與「如何立命探索」這兩種「技能」

⁶⁷ 顧準，《顧準日記》，頁234、186-187。

⁶⁸ 顧準，《顧準日記》，頁186。

⁶⁹ 顧準，《顧準日記》，頁186。

⁷⁰ 顧準，《顧準自述》，頁312。

間達到一個平衡點。在商城時期，顧準運用前項技能，成功保全自己並且如實記錄下大躍進所造成的饑荒災難；而在文革期間，顧準在勞動改造、檢查交待等等肉體與精神上的折磨是少不了的，但他依然勉力投入研究探索的工作，儘管真正能夠利用來寫作的時間也不過是他生命中最後短促的兩年，最終仍舊留下記錄、反思和探索的思想文集。而這樣的成果，實是基於他執著探索與理論勇氣而來的。